

■ 包利民·柏拉图与价值分立：古典政治哲学策略的一种评估

■ 先刚·柏拉图未成文学说的几个基本问题

■ 李风华·政治共识是如何可能的：罗尔斯方法论述评

■ 刘森林·异化：一种概念批判

■ 林晖·康德实践理性中的理性兴趣说

哲學門

1

■ 第五卷（2004）第壹册 ■ 湖北教育出版社

■ 沙涓·蒂利希的神哲学与视觉艺术

■ 刘清平·张力冲突中的爱之诫命：基督宗教伦理学的一个深度悖论

■ 吴震·泰州学案的重新厘定

■ 李天纲·儒家的宗教性：从《中国礼仪之争》两个文本看儒耶对话的可能性

■ 黄棕源·东学与近代文明的出路

Beida
Journal
of
Philosophy



■ 第五卷 (2004) 第壹册 ■ 湖北教育出版社

哲學門

1

*Beida
Journal
of
Philosophy*

10.83
458

67004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门.第5卷.第1册/赵敦华主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ISBN 7-5351-3985-X

I. 哲… II. 赵… III. 哲学—文集 IV. 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1670 号

出 版 :湖北教育出版社
发 行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电话:83625580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430074·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 1037 号)

开 本:787mm×1092mm 1/16 2 插页 16 印张

版 次: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307 千字 印 数:1-2 000

ISBN 7-5351-3985-X/G·3285

定 价:25.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哲學門

第五卷(2004)第一册

目 录

001 张岱年先生的生平与贡献

论 文

005 包利民/柏拉图与价值分立:古典政治哲学策略的一种评估

016 先 刚/柏拉图未成文学说的几个基本问题

039 李风华/政治共识是如何可能的:罗尔斯方法论述评

059 刘森林/异化:一种概念批判

075 林 晖/康德实践理性中的理性兴趣说

089 沙 湄/蒂利希的神哲学与视觉艺术

108 刘清平/张力冲突中的爱之诫命:基督宗教伦理学的一个深度悖论

129 吴 震/泰州学案的重新厘定

153 李天纲/儒家的宗教性:从“中国礼仪之争”两个文本看儒耶对话的可能性

178 黄棕源/东学与近代文明的出路

评 论

200 彭国翔/当代中国的阳明学研究:1930-2003 年

书 评

221 李明辉:《孟子重探》《当代儒学的自我转化》(丁为祥)

232 王志成:《和平的渴望》(周伟驰)

240 彭 锋:《诗可以兴》(徐辉)

246 张明仓:《实践意志论》(熊在高)

250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张羽佳)

Contents

Biography of Zhang Dainian & His Achievements	(001)
--	-------

Articles

Plato and Value Pluralism: A Reevalu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Bao Limin(005)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Plato's Unwritten Doctrine	Xian Gang(016)
How Is Political Consensus Possible: A Review of Rawls' Methodology	Li Fenghua(039)
Alienation: A Kind Of Conceptional Analysis	Liu Senlin(059)
Rational Interest in Kant's Practical Reason	Lin Hui(075)
Tilliach's Philosophical Theology and Visual Art	Sha Mei(089)
The Double Love Command in Tense Conflicts: Oh an In-Depth Paradox of Christian Ethics	Liu Qingping(108)
A New Stipulation on "taizhou-xue'an"	Wu Zhen(129)
The Religiaosity of Confucianism: Exploring the Possibility of Confucian-Christian Dialogue from Two Primary Documents in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during Qing Dynasty	Li Tiangang(153)
DongHak and Outlet of Modern Civilization	Huang Zongyuan(178)

Review Articles

Studies of Wang Yangming and His Follow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1930 - 2003	Peng Guoxiang(200)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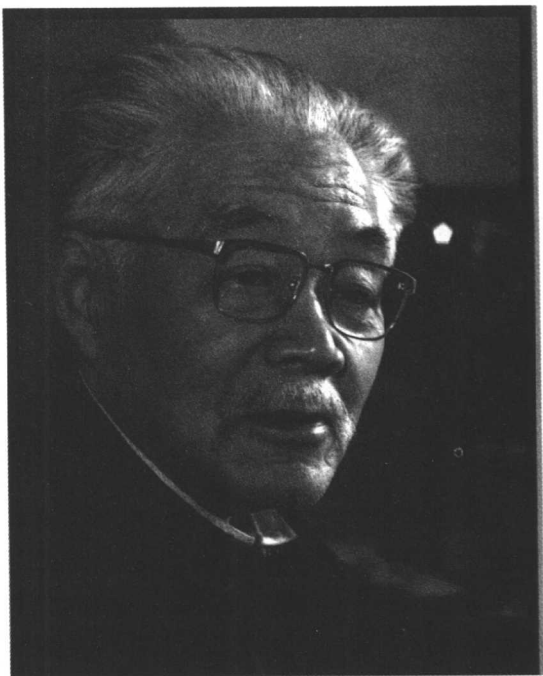
Book Reviews

Li Minghui, <i>Reevaluation of Mencius: Self-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i>	Ding Weixiang(221)
Wang Zhicheng, <i>The Hope of Peace</i>	Zhou Weichi(232)
Peng Feng, <i>Poetry can Make one Uplifting</i>	Xu Hui(240)
Zhang Mingchuang, <i>On the will of Practice</i>	Xiong Zaigao(246)
Jacques Derrida, <i>Specters of Marx</i>	Zhang Yujia(250)

张岱年先生的生平与贡献

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岱年先生,因患心肌梗塞引起心衰竭,经救治无效,于2004年4月24日凌晨2时50分在北京大学医学部附属第三医院逝世,享年95岁。

张岱年先生生于1909年5月23日,字季同,别名字同,原籍河北省献县。1928年10月入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学习,1933年毕业后受聘到清华大学哲学系任助教,1936年写成了他的名著《中国哲学大纲》。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先生因与学校领导失去联系,未能随校南行,在北平蛰居读书,保持民族气节,不与敌伪妥协;1943年任北平私立中国大学哲学教育系讲师,次年改任副教授。抗战胜利,清华复校,1946年张先生回到清华大学哲学系任副教授,1951年任教授。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张先生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57年,张岱年先生因对哲学系和教研



室的若干工作作风提出了一些善意的批评意见,遭到错误打击,一度停止教学工作,1962年得以恢复。1978年起,张先生担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在教学和研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1981年张先生被教育部批准为首批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导师,次年开始培养博士研究生。1979年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张先生被推为会长,并经选举连任三届会长,后任名誉会长;此外还先后兼任中华孔子学会会长、名誉会长、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职。

张岱年先生是我国哲学界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早在20世纪30-40年代,

张先生就以唯物论为基础,综合分析方法、道德理想,建立了自己的具有综合性的哲学体系。他是现代中国少数有体系的哲学家之一。这一综合体系的特点是赞扬唯物论和辩证法,兼采分析派哲学的分析方法,同时继承中国哲学重视道德理想的优良传统。张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著述等身,有着极高的造诣和广泛的建树。他的著作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概念、问题、体系及其起源、演变等做出了全面的论述和准确的分析,体现了他在把握中国哲学方面的广阔性和深刻性。他的研究重视阐扬中国哲学固有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思维传统。他是当今中国哲学研究最有威望和成就的大师,他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80年代以来,张先生力倡“综合创新”的文化观,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张先生从教70年,桃李满天下,为教育和科研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他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贡献给了中国学术与教育事业。

张先生一生追求进步,从上个世纪30年代起,就积极宣传辩证唯物论,不断探索真理。抗战时期,坚决反对卖国投降。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中,张先生对清华大学学生发表谈话,坚决支持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行动,表明了进步的立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步入了一个新的伟大时代,张先生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改造,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之中。1949年张先生在清华大学最先讲授了“辩证唯物论”,1951年讲授“辩证唯物论研究”和“马列主义基础”,并参加大课讲授“辩证法”和“新民主主义”课程。同年,他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在师大讲授“新哲学概论”,并在辅仁大学讲“辩证唯物论”课程。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张先生虽遭受打击,几经挫折,但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始终未变。1983年张先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心愿。张先生还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

张岱年先生从大学时代开始,便对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十分信服,他肯定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当代最有价值的哲学。他认为辩证唯物论在宇宙观中既肯定物质为本原,又承认精神的能动作用,解决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在认识论中则解决了感性和理性的关系问题;历史唯物论则解决了学术思想与社会经济的关系问题。这使得他在世界观上开始接受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同时,他认为英国分析派哲学概念明晰,论证缜密,确应加以吸取。从这里他开始提出自己的哲学见解,即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同时力图以分析方法加以论证。抗日战争期间,张先生进一步思考宇宙观、人生观和认识论的根本问题,1939年至1944年间,他写成了书稿五种。这些论稿所形成的“新唯物论”体系,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提出的唯物主义、分析方法与道德理想相互结合的见解的进一步发展与具体化、体系化。

《中国哲学大纲》是张先生的成名作,也是中国古代哲学固有体系、问题、范畴

研究的开创之作,是中国哲学通论研究的典范。与一般的中国哲学史通史著作按历史顺序叙述历代哲学家的思想不同,《中国哲学大纲》则是把古代中国哲学作为整体,按照不同的哲学问题分门别类地加以阐述。因而这是一部以问题为纲的中国哲学问题史。在这部著作中,张先生着重考察分析并阐明了中国哲学的固有体系、独特结构和概念范畴。对中国哲学特有的范畴概念如气、天、理、道、神、本根、大化等做出了准确分析。在全书的组织结构上,基本采用中国哲学固有的概念范畴,以显示出中国哲学的特点。这部著作在现代中国哲学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院系调整以后,北京大学哲学系重新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由张先生讲授汉代至明清的中国哲学史。当时由张先生负责编写并在1956年发表在《新建设》杂志的《中国哲学史讲授提纲(宋、元、明、清部分)》,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为分析宋、元、明、清哲学提供了基本线索,直到今天,一些学有成就的宋明理学研究者仍常常回忆起这个讲授提纲带给他们的益处。1958年以后的一段时间,他专门从事哲学史资料的整理,主持《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全8册的注释工作,这些教学资料不仅在配合60年代的教学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今天从事哲学史教学的同志仍是必不可少的。1978年以后,年过70高龄的张先生焕发了学术青春,陆续写作并出版了《中国哲学发微》、《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中国古典哲学范畴要论》等十几部著作和上百篇论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研究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张先生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基于对中国哲学的通贯把握,他揭示出中国哲学的许多重要特点,这就是:从部分上说,中国哲学在本体论上的基本观点是“体用统一”,中国古代哲学的宇宙观是“天人合一”,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论的基本思想是“真善同一”,中国哲学在理想和生活关系上最重视“知行一致”。从总体上说,中国哲学的发展有一个长久的唯物主义传统和辩证思维传统,特别是辩证思维的传统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独特的思维方式;中国哲学的整体结构表现为本体论,认识论与道德论的统一;中国哲学的表述形式是哲学与经学的结合,通过对经典的解说表述自己的哲学见解。张先生的学风以严谨著称,对于文献资料十分精熟,他始终强调以“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精神深入中国哲学思想的分析。他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最重要的方法范例。

在对待古代文化的基本态度上,前人泥于“信古”,五四时期提倡“疑古”,冯友兰先生主张“释古”,张先生则提倡“析古”,主张在分析的基础上批判继承。他认为中国哲学是有优良传统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刚健不息”、“厚德载物”。1985年以后,他重新发挥在30年代提出的“综合创新”的文化观,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复古主义,这一文化主张在90年代发挥了更广泛的影响。

张先生从教七十余年,学生中多数已成为今天教学和研究的中坚。张先生既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导师,又是一位诚恳宽厚的长者。接触过他的同志、朋友、学生

莫不受到他平易近人作风的感动。他在弥留之际,仍然关怀着哲学系学生的学习状况。

张岱年先生是当代中国哲学界的学术泰斗、一代宗师,他的逝世是我国哲学界的不可估量的损失,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张先生的遗志,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继续奋斗和努力!

张岱年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学术精神永垂不朽!他对我们的教诲和关爱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柏拉图与价值分立: 古典政治哲学策略的一种评估

包利民

Plato and Value Pluralism: A Reevalu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关键词:柏拉图 政治哲学 价值哲学

提要: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性政治哲学可以从处理类似的问题的两种不同的“策略”的角度进行比较和考察。从这一角度思考柏拉图,我们发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结论:古典政治哲学走的策略是价值的“多元论”或“分立”,而现代性的策略所依托的本体论和价值论却本质上是一元论的。由此出发,环绕柏拉图政治哲学的一些著名误解或许可以得到澄清。

作者:包利民,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

如果有人说现代性政治哲学的基本价值趋向是一元论的,而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价值模式是多元论的,肯定会引来疑惑和反对,因为柏林的著名文章似乎已经下了定论:现代性的进步就在于认识到多元的重要,不再企图在政治中贯彻绝对一元论。但是,这一“常识”会不会是一种偏见?古典性和现代性政治哲学采取的解题策略的不同特点究竟应当怎样规定?本文想通过分析柏拉图的一些文本,对此提出一些想法。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一个与柏林论题正相反的立场: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哲学走的策略是价值的“多元”或“分立”,而现代性的策略所依托的本体论和价值论却本质上是一元论的。

不错,从表面上看,现代性捍卫的核心价值就是价值的“多元”与“宽容”,是“消极自由”,是“民主”。“民主”当然反对一元等级的价值思想。

但是,这一策略实际上是“一元论”的。或者说,如果它必然导向一元论,是毫

不奇怪的。首先,现代性政治哲学中道义论一派的“权利”、“公平”等等话语的突出,很容易使大众感到物质利益是唯一的好,最高的好,终极的价值。其次,就功利主义而言,这就更明显了。虽然功利主义强调“快乐”并不是指简单的物质快乐;一切价值都是快乐,都值得追求;但是,起源于启蒙治疗型哲学的功利主义的工作显然是把本体下调一级,以“顺从自然”为宗旨。在理性化和去魅化的“数学—力学”的机械论图景中,过去看作真实的东西如灵性、心灵、意志自由都被看作是虚假的。于是唯一可以公共认可的便是工具理性或经济化思维:根据最低成本,获得最大效果。其导向下的社会价值取向只能是一元论的或还原论的:真正的价值是且仅仅是经济的价值。占据现代哲学主流的现象一元论(20世纪早期的英美经验论与20世纪后期欧陆的“后现代”在此有某种意味深长的交叉共识)正是对价值上的一元论提供支持。

有人为 utilitarianism 被译成“功利主义”感到抱不平,说这是容易引起贬义理解的误译,应当译为“效用主义”。正是如此。用“经济”做标志的现代性一元主义价值实际上指的是一种普遍的“效用主义”思维模式。在此,“经济”也作广义解,它指称一种思维和行为方式。这不仅是指经济活动本身的急剧上升为社会的中心,而且是指其他社会部门的基本架构都按照经济模式构造,“多元”的价值和生活形式于是身不由己地向某类特定的价值追求跌落、聚焦。所谓“功利”或“效用”,主要是效率或收益最大化计算,利润追求,消极自由,消费水平及权力感等。“一切无非为了个人效用的最大化”。这样的主导思维模式是典型的价值一元论或还原论。虽然这种一元论很难说是强制贯彻的,但是其巨大的“强制性”效应是任何人都可以感受到的。^①

更重要的是,价值一元论不仅是现代性的一种事实上的无意识后果,而且是其政治哲学策略的规范上的刻意追求。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策略路线是:接受“给予”,接受而不质疑现存价值。对于国民,“加总”其即有之价值诉求,然后尽量满足,从而为政者获得合法性证明(福利国家);对于政治家,是假定他们的价值诉求与普通国民的并无二致,于是公开制约或令其争夺在互相冲突中平衡和削平,从而更好地掐住利维坦的脖子(公共选择理论)。正因为此,虽然许多自由主义哲学家们本人在一己的生活中不必持价值一元论,他们有的甚至还偏好饮酒和迷狂,并写诗;但是他们对于社会整体的价值一元论趋势并不担忧,最多视为应当付出、可以接受的代价(比如罗蒂)。

二

现代性策略在古代已经有类似的倡导者,这就是智者。智者不是少数几个人

① 参看包利民、斯戴克豪思:《现代性价值辩证论》,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

的事情,是一场“运动”,这就意味着世界史上崭新的一种生活形式出现:自觉担纲对人本身的反思、对人的政治生活和价值的本质进行认识和提出指南的文化人生活形式的出现。^① 由于这是新生活形式,人们不理解,常常要问:你们这种人到底算干什么的(οοτιςεστιν)包括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也加入追问。^② 这一问题中往往内涵着强烈的敌意,所以智者很气恼。智者反复安慰社会:虽然智者构成了古代政治和经济两大传统生活形式之外的另一种生活形式,是专门提供价值论证的(“诗人”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属于这样的生活形式,而且更古老);但是,智者与生活不敌对,顺应民心,“顺从自然”(与 νομος对立的 φυσis)。首先,他们论证政治“无非是”个人效用的最大化。古代希腊的价值秩序在城邦出现后确定了“政治”与“家政”(economy 本义,私人性生活)二分,而且前者高于后者。智者却提出了历史性的“新观点”:政治应当为家政服务。这分为两个方面。就国民而言,政治家服务于大众的欲望的加总。就政治家而言,政治家之所以服务大众,是因为自己想追求同一种利益的最大化——权力以及权力所带来的其他好处。^③ 很明显,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所以批评智者,不仅仅是因为智者推许一般的纵欲与享乐的好处(虽然这也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花费了很多精力批评的^④),而且更重要的是智者对于“绝对权力”之“好处”的艳羡和宣扬上;不仅仅是是否把美酒盛宴当成人生目的,而且是能否“有仇就可以报,有愤懑不必自个儿受着”的舒畅。民众和贵族为什么要如此积极夺取政治权力作“主人”? 理由只有一个,就是争相当狼王,以便过上可以放纵一己之私、任意剥夺其他人或阶级的利益的僭主式美好生活(“美好”αγαθον 也可以翻译成“善”;“最好”也可以翻译成“至善”)。其次,不仅政治可以归结为基本利益最大化,而且新出现的文化人所追求的价值也是权势等基本利益的最大化。智者对此毫不讳言,还以此吸引徒众,笑傲苏格拉底等穷酸。总之,新文化人证明社会各个生活形式的价值都可以而且应当还原为一。

值得指出的是,智者与其说类似于现代性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主义一线,不如说类似于尼采、施密特等一线。他们更从“策略”的角度理解政治。但是,他们在“回到自然”上与自由主义之现代性主流政治哲学并无二致。

柏拉图以智者为起点。首先,他感到最需要澄清的就是这个社会上新出现的、自己也隶属于其中的以价值为业的“元”生活形式的本质。“智者与诗人”是柏拉

① 智者的抱负决不在传授辩论术之类,而在更“高级”的对于“政治-人生”的智慧和教授上。参看《尤息底谟篇》开头,《拉黑斯》186A。

② 《高尔吉亚篇》447C。

③ 参看《理想国》339A。

④ 比较著名的论证如柏拉图之批评欲望人生是“漏斗”一样的灵魂,“痒-抓痒”类的快乐;亚里士多德批评其为“延长食道类”幸福追求。

图的两大敌人。他们自许 (profess) 垄断着对于政治——正义与不正义, 好与不好——的知识或智慧。柏拉图的著名论断众所周知: 他和智者不一样, 智者是有智慧的, 他则只不过是“追求智慧”或“哲学”(古词是“爱智慧”)。然而这种谦逊的背后是毫不妥协的信念: 哲学之所以必要, 正是抗衡现有主导生活形式的价值霸权。^① 价值以及围绕它们所组成的生活形式必须分立, 必须被分成不同性质的几层:

- A 对存在和价值的认识
- B 公共生活
- C 个人性效用最大化

只有在这一背景下, 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柏拉图本体论上的“线段比喻”的分立与分离学说:

- A 存在
- B 既存在又不存在
- C 不存在

有关柏拉图的本体论的争论很多, 其中著名的争论就是柏拉图到底有没有主张本体论上的“分离”。有的学者出于善意而辩称柏拉图不至于蠢到主张“分离”。然而, 我们认为柏拉图主张“分离”, 他的“本体论”上的“分离”理论以及心理学上的知情意三分的学说正是价值分立的理论上的支持。《理想国》的讨论从“正义与好”过渡到“存在(是)与好(善),”不是偶然的。

柏拉图的“分立”是使哲学、政治与经济区分开来。但是, 给人印象最深的政治与经济的古典分立可能是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一卷中^②, 而柏拉图给后人的鲜明印象却是区分“哲学”与“政治”, 贬低政治而抬高哲学。这使他不仅受到智者从“经济一元论”而且从“政治一元论”(希腊“正统”主导生活形式)的角度加以批判。如智者指责柏拉图哲学使得人们丧失阳刚之气, 无法进入公共生活, 只能“躲在某个角落里窃窃私语”^③。现代诗化政治哲学家尼采和海德格尔反对柏拉图之毁坏希腊精神, 也与此有关(比较: 罗尔斯认为哲学与政治距离很近。后来, 今

① 参看 Plato, *The Republic*, Translated with Notes and Interpretive Essay by Allan Bloom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68), p. 392.

②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开头便论证家庭与政治是极为不同的两个领域。前者是私己的、主人与奴隶关系的, 后者是公共的、自由人之间的。无独有偶, 柏拉图为了培养公心, 也对家庭提出限制。这一思想——个体家庭在历史上是“私”之源——不是偶然的, 其他人如恩格斯也曾大力主张过。亚里士多德甚至认为柏拉图的“共产主义”思想正表明他还没有严格区分公共领域和非公共领域。

③ 《高尔吉亚篇》485D。

日柏拉图主义者却讥笑他的哲学不算哲学。^①再后来,罗尔斯干脆把自己的“政治哲学”称为是“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柏拉图之所以“反对政治”,并不是反对政治本身;事实上,他说自己是或几乎是“我们时代唯一从事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的人(πραττειν τα πολιτικά μόνος των νυν)”^②。他反对的是当时政治中的混蒙不分的价值一元论。价值的“分立”是柏拉图的政治哲学策略。这可以从各个角度看。

首先,整体的价值与个体的价值分立。柏拉图是唯实论者,他认为整体有不同于部分之加总的价值。一般政治家关心的只是如何(通过什么“程序”)加总、反映公众的偏好。自由主义哲学家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会导致人们争夺一元的、很难共享的物利型之“好”从而产生两极分化和激烈冲突的危险,但是他们相信激烈的竞争有推动种族的进化的好处(康德的“历史理性”),所以最终还是可取的策略。智者是一元论者,亦即从个体的偏好的“加总”来看政治-整体之好。如果所有人都爱好权力,则一个帝国伟业的国家就实现了整体之好;如果所有人都追求快乐,一个物利极大丰富的国家就实现了整体之好。按照柏拉图的整体主义以及他对于斯巴达政治的推崇,本来是可以推出他会主张“强大”、“征服”、“勇敢”之类超出个体价值集合之上的独立的有机整体的价值(波普尔[Popper]或者以为柏拉图主张的就是这种有机整体利益的张扬?)。但是,柏拉图不承认个人的偏好是唯一的“真好”,不承认个人的所有偏好的加总就是整体之好。在以“反对讨好术”为主旨的《高尔吉亚篇》中,苏格拉底一针见血地说:智者引以自豪的演讲术不是真正的政治技艺,而是冒充政治技艺的“造乐术”或讨好术,它所做的事情是为大众制造假好的经验。^③柏拉图经常批判的对象之一就是帝国伟业。“勇敢”之类,军人政治,柏拉图不无微辞。整体的真正利益,不是帝国扩张之类的假好,而是和谐:高低成分各处其位。如此,则“扩张”、“强大”之类日常之“好”恰恰意味着有机体没有达到它的真正的好,即和谐或健康,因为本应和谐平衡的整体中的某一个环节——“激情”环节——傲慢造反,过分夸张。^④

其次,政治家的价值与大众的分立。如果说现代性政治哲学制服利维坦的策略是公开承认政治家的逐利性并以利益制约利益,那么柏拉图驯服狼王冲动的策略就是为政治家建立不同的价值,并且令其“迷狂”地追求,从而一举解决领袖与民争利的老问题。至于大众,则允许他们适度追求物利。但是必须明确:以

① 见《现代学术与公共性》,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35页。

② 《高尔吉亚篇》521C。

③ 《高尔吉亚篇》467A, 518A。

④ 《理想国》442A。

追求物利为基本生活形式的从业人员不得同时追求掌握政治权力。^①说到这里,显然就已经说到柏拉图的著名的“正义”论了。《理想国》里对正义的“各行各业各处其位,互不干扰”的定义^②不知道惹恼了多少民主斗士,也不知道使多少“贵族”窃喜,引为同道。现象学说:回到事情本身。《理想国》的本身是在讨论正义。而“正义”在古代(以及在现代)“法律”几乎是同义词;“政治”(国内政治)的核心在希腊就是法律:立法与司法。日常的正义与否的问题就是是否合乎法律的问题。问“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正义的人?”相当于是在问这个人是不是遵守法律——还是践踏法律?亚里士多德说过这个话^③,《理想国》的线索也是这样构造的。第1卷中,苏格拉底与大家讨论的实际上是民法与刑法问题:还债问题、订立合同与报复问题中的正义。^④第2卷苏格拉底论证自己观点时,已经悄悄地置换为宪法问题:政府构造中权力分配的正义问题。再后来,则更进一步变成教化法或礼法问题。《高尔吉亚篇》中在定位智者之术为讨好术时,也点出了它们是真正的技技艺——法律(包括司法与立法)——的扭曲了的影像。^⑤换句话说,柏拉图认为政治伦理的真正知识在法律中。

由于各种原因的缘合,古今学问家往往讨厌法律,不愿意让自己的高贵的学问比如“正义”与法律牵扯到一起;青年期的人热爱自由,宁愿听讲抨击压抑疯癫与打碎禁闭的哲学而不愿听什么守法、秩序与溶入文明社会。但是事实上,高蹈理想的柏拉图虽然自己常常敲打“法律”,但是他的正义论与法律有内在的关系。这当中可以看到与现代性真正的政治洞见——不是“民主”,而是立宪和法治——相通的东西。对于柏拉图,法治重要。即使差的法律也比没有法律好。为什么?一个是稳定。法治与人治的不同就是稳定或通俗所讲的“有法可依”。政治中最可怕的恐怕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随心所欲或无法无天。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一直继承巴门尼德的求索流变中不变而稳定的真正之“是”的传统,除了逻辑-语言学上的原因,就是政治-法律上的原因:稳定不变的,就是好的。^⑥第二,法律与正义的内在关系还同柏拉图对于“技艺”、“专家”的强调有关。立法与司法是民主雅典政治生活中占据中心的大事,智者在其中如鱼得水,方方面面发挥着能量。由于直接涉及人的利益(的伤害),司法比“鞋匠”、“舵手”等等更能体现专家还是大众、群情激愤还是专业评判之间的冲突或权力争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所以

① 《理想国》421B。

② 《理想国》434C。

③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第5卷。

④ 《理想国》331C-333A,

⑤ 《高尔吉亚篇》463C-465C。

⑥ 《理想国》380E:“事物处于最好的状况下时,最不容易被其他事物改变或影响。”

不满意于雅典司法,就是认为这个领域中没有建立象鞋匠、舵手、医生那样的逻辑的、公认的、专家性的权威。^① 第三是正当性。一切稳定的法律,尤其是希腊公民城邦政治中的稳定的法律,必然有一定的正当性(legitimacy),也就是一定的兼顾性。反对法治,主张一个利益集团或一个人的统治的,无非是想破坏兼顾性。《理想国》中柏拉图的智者敌手色拉西马库斯主张:“正义”-政治是强者的利益;“苏格拉底”的另一个挑战者格罗康则说:人人都想当“隐身人”,以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无拘无束。政治不过是谋私的一个领域——实际上它还是谋私的最佳领域。

柏拉图破解这一问题的策略是动摇价值体系本身。突破这一一元论框架,建立全然不同的价值,引导政治家追求“高级的价值”,“一个人的欲望在一个方向上强时,在其他方向上就会弱,这完全象水被引导流向了一个地方一样”^②。这种策略的关键是论证存在着“不同的、更高的”价值领域,批判“所有快乐一律平等,应当受到同等的尊重,轮流满足,机会均等”的古代价值民主论或一元论。^③ 柏拉图并非不知道这是一座窄门,一条困难的策略路向。柏拉图的心理学的“斗争”的心理学,它凸现灵魂中的恶的成分的强大。人是肉身化的,所以避不开快乐和痛苦的强大的诱惑。^④ 柏拉图的哲学工作可以看作是在围绕此展开。第一,用实践理性论证,正义之好或正义之生生功效实际上有目共睹。即使黑帮,如果内部没有一定的公正,也会瓦解。^⑤ 第二,用哲学论证。如果人生所有价值就是智者——也是大多数人——所理解的这些,那么,柏拉图不否认政治的本质是悲观的。但是,我们大众之所以只知道这一系列的价值,会不会是由于我们生下来就被囚于“洞穴”之中?从而不能甚至稍稍抬头一瞥真正的价值?^⑥ 哲学的任务是辨析与分离出与“权力-物利”系列价值全然不同的、独立的、更为高超的一个价值系列。好不是快乐;快乐是为了好,而不是好为了快乐。^⑦ 第三,价值视野的改变决不能仅仅靠

① 《理想国》493C。

② 《理想国》485D。

③ 《理想国》561B。

④ 《法律篇》。

⑤ 《理想国》352C,369B。

⑥ 《理想国》584E:“没有经验过真正的快乐,没有资格评判。”586A:“这些人从未再向上攀登、看见和到达真正的最高一级境界或为任何实在所满足或体验到任何可靠的纯粹的快乐。他们头向下盯着筵席,就像牲畜俯首牧场只知吃草和交配一样。……由于不能满足,他们还像牲畜用角和爪互相踢打顶撞一样用铁武器互相残杀。”

⑦ 苏格拉底的宣告——“自知无知”——常常被人们理解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智性上的谦逊,不敢自称已经真理在手。这当然不错。但是,“自知无知”的提出的主要目的恐怕不是自我批评,而是批评他人,批评一般以为智慧在手的智者和权威,因为他们的知没有超出意见之知,所以不能自称是(所有的)知识。(《高尔吉亚篇》506A,518A)